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葛建廷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日本 东南亚 经济外交 “小泉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

一 引言

日本战败后，历史条件决定了其经济外交在本国外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国际方面看，日本是战败国，必须遵循盟国所规定的《波兹坦公告》、《开罗宣言》等条约以防止军国主义的复辟。这就排除了日本像战前那样利用军事手段对东南亚各国侵略或干预的可能。1951年生效的《旧金山条约》，虽然允许日本建立自卫队，但是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强烈反对日本再军事化。从国内情况看，日本宪法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而限制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采取的方式。只有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日本才能打开东南亚国家的大门，获得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因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明确了其外交的基本任务：即一方面

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安全;另一方面,为促进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主张与亚洲各国接近。^①从吉田茂首相开始,日本尝试发展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但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而且由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未实现,日本与中国开展民间贸易的政策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岸信介上台后,把聚焦于中国的眼光转向了东南亚各国。^②日本通过战后赔偿,而后又经过官方发展援助(ODA),推动了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1952年7月,岸信介首相强调:“日本经济已经复兴。从确保市场考虑,东南亚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日本要在通过自己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新兴国家确立经济基础的同时,力求扩大市场,以此形成双方之间紧密的政治关系。这是日本外交发展的方向”。^③

日本在东南亚外交能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图1的坐标轴来表示。如果把日本的外交分成4个象限,第一象限表示日本的外交能力很小,可以称之为“对美依存型”外交;第2象限表示,日本的外交能力慢慢提升,但依然是“对美依存型”外交,不过已经开始实施以亚洲为主要方向,以调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为主要目标的“桥梁外交”;第3象限表示,日本的外交能力大幅度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力量逐渐撤离,日本开始在亚洲开展“积极外交”;最后,第4象限表示,日本将自己定位为亚洲的一员,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目标,开展“重视亚洲”的外交。

第1象限以20世纪50、60年代的“吉田主义”为代表,西方倾向性(对美外交一边倒)很强,主要推行“对美依存型”外交政策。^④第2象限代表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亚洲逐步撤离,日本开始重视与东南亚发展关系,倡导“福田主义”。^⑤第3象限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外交能力大幅提升,例如向柬埔寨派遣维和部队等,可以视为日本积极外交的表现。^⑥第4象限代表对东南亚国家施行积极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⑦因此,通过图1的坐标轴,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外交政策的特征和重点。

① [日]五百旗头真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② [日]山影进:《東アジアの変容》,《国際問題研究》,东京:国际问题研究所2008年版。

③ [日]吉本重义:《岸信介传》,东京:东洋书馆1957年版,第2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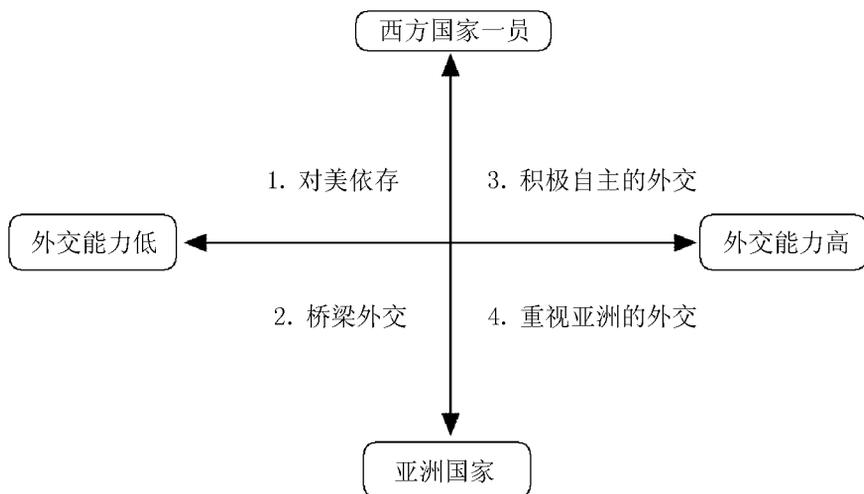
④ 孙晓光:《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⑤ 同上书,第127-128页。

⑥ 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⑦ 同上书,第455-467页。

图1 日本的东南亚外交能力示意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

下文将从第1象限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分析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轨迹(参见表1)。

表1 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的日本对东南亚外交

时间	中美苏(中美俄)关系	东南亚形势	日本外交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60年代	西方封锁中国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尼克松主义	摆脱西方的殖民 亚非会议 分化阵营 东盟形成	对美依存 亚洲一员 东南亚开发
20世纪70年代	美中苏三角博弈	东南亚变化 东盟经济发展	福田主义
20世纪80年代	冷战 冷战结束	柬埔寨纷争 东盟强化	摸索自主外交
20世纪90年代	发展经济	“东南亚化”	自主外交与对美依存
21世纪前10年	经济大发展、美国重返亚洲	共同体进程	强调对美依存和独立自主

注：表格由作者自制。

二 日本战后经济外交的历史梳理

(一)“吉田主义”与“对美依存型”的东南亚经济外交(20世纪50-60年代)^①

日本对美依存外交的典型例子就是“吉田主义”外交。当时,亚洲正处于冷战时期,战败国日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把美国当做“监护人”,实行对美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其结果是诞生了日本战后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主义”。

众所周知,1948年,美国公布了对亚洲的“马歇尔计划”,目的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工厂”。^②此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政府逐渐公开对日本的“扶植”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朝鲜战争也为日本带来了“特需经济”。但是早在1951年,日本就预料到“特需经济”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经济协作条约》,通过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和东南亚的资源的有机结合来复苏日本经济,这是日本与美国合作的首要目标。

重视日美合作的日本首相吉田茂结合东南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第一,日本政府于1953年12月确立了“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整合日本在东南亚的部门机构,交予亚洲协会统一管理。通过亚洲协会进行经济合作,是防止给东南亚国家留下“经济侵略”的印象。与此同时,日本还在东南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以推进双方合作;(2)通过技术协定促进技术人员的交换和人才培养;(3)防止双重征税、协调经济合作;(4)为了促进核心设备的出口,鼓励进出口银行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以确保所需的资金;(5)征收必要的税收;(6)与亚洲国家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7)实现对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尽快对相关国家进行战争赔偿。赔偿通过“日美合作对东南亚的投资”进行,结果变成经济投资活动,战争赔偿也成为经济合作的一个环节,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由此与日本的经济至上主义挂上了钩。

第二,参加英国主导的科伦坡计划。^③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是基于以下考虑:(1)在与东南亚的关系中,日本的主要贡献是技术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可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2)加强对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援助,规范双方的经济合作;

^① 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第408-432页。

^② 关南、赫赤、姜孝若:《战后日本政治》,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青書——わが外交の近況》,1957年。

(3) 确保东南亚成为日本机械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与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协作,开发发展中国家以提高日本的经济水平,这是日本与东南亚经济协作的初衷,也是日本南北外交的起源。

第三,倡导被称为“亚洲版马歇尔计划”的“东南亚开发基金”,推动对美从属外交。签署科伦坡计划后,吉田首相在日美峰会中提出,将投资40亿美元用于建立科伦坡计划基础的“东南亚开发基金”。^① 不过,由于需要依赖美国资金,加上是吉田茂自己提出的设想,因而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寻求的“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资源”这个构想仍然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政策。

为进一步推动“吉田设想”,1957年,岸信介开始对东南亚进行访问。这是二战后日本首脑首次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为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的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并且,这次访问不仅解决了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的战争赔偿问题,还提高了日本金融界对东南亚的关注度。最重要的一点是岸信介首相再次提出了“东南亚开发基金”构想。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确认东南亚国家对这个构想的反应。结果与“吉田设想”一样,“东南亚开发基金”设想也没有得到落实。但是,通过此次访问,日本给东南亚国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即相比美国,日本具有向东南亚投入更多资本的意愿。在岸信介就任首相期间,外务省和通产省在1957年和1958年分别发表了《外交白皮书》和《经济合作白皮书》。在《外交白皮书》中,日本政府第一次阐述了对亚洲外交的基本原则:以日美协调为基础进行对亚洲的经济外交,把“日本和平的对外经济贸易”作为外交路线。此后,日本通产省颁布了《经济合作白皮书》,特别强调“从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来看,对东南亚阶段性地推进经济协作非常必要”。但是,本来可以推进积极的亚洲经济外交的岸信介,因为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延长问题下了台。接替岸信介的是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首相。为了回避国内政治问题,他们都主张优先发展经济。正是这一时期,日本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佐藤首相积极推进了地区经济合作化并在1966年启动了“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② 日本外务省把这个“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作为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平台。虽然设立了部长级会议,但由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仅是美国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东南亚各国并没有积极支持日本。在1966年的东京会议、1967年的马尼拉会议、1968年的新加坡会议和1969年的曼谷会议中,东南亚各国对日本“对美依存”、只顾自己的对外援助政策相当排斥。

①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青書——わが外交の近況》,1958年。

② 日本外务省编:《我国外交近況》,1967年。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受越南战争影响,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东南亚观。与此同时,东南亚也出现了地区主义的萌芽。由于受亲美的“吉田主义”的影响,日本对地区主义并不积极。1967年8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立后,日本外务省和通产省的反应和评价并不积极并发出了否定的声音。这种消极反应与反对意见在70年代初期开始显现出来。然而,从1971年东盟五国外长发表《中立化宣言》(ZOPFAN)、1973年进行的“合成橡胶谈判”到1974年发生的“反日运动”来看,日本对美外交“一边倒”的战略已经过时了。

总之,从冷战到目前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演变,体现了日本和美国外交政策相呼应的对美从属外交。而且,日本忠实地执行了“在美国的温室中成长的日本”的基本路线,实施“轻武装、经济外交与政经分离”的“吉田主义”;并通过经济外交,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当时日本的对美依存确保并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利益。

(二) 福田主义和“桥梁外交”的展开(20世纪70年代)

佐藤荣作执政时期,是日本“桥梁外交”的准备期,而繁盛期始于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各国之后。从国际层面来看,“尼克松主义”出台后,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美国开始从东南亚缓慢撤退。在这个空隙中,日本开始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由于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需要稳定的海外市场。在赔偿外交之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当初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经济援助被日本利用起来,帮助东南亚各国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为日本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①在此背景下,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进入了繁盛期。同时,福田赳夫政府开始实施“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并将其制度化。

严格意义上的“桥梁外交”实践,始于越南战争结束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具体以1977年8月出台的“福田主义”为开端。其背景是,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化”。越南战争的终结是美国从东南亚撤退的开端并导致了地区安全保障的空白。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化”,虽然促进了东盟的团结,但也助长了意识形态的对立。

由于东南亚形势急剧变化,日本开始转变“对美依存型”外交。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第一,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特别是1974年的东南亚国家的“反日运动”对日本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虽然日本外务省重视对欧美的经济外交,但外务省的“亚洲派”势力正慢慢上升;第三,日本政治领导人对东南亚地

^① Jusof Wanandi:《日本与 ASEAN 关系的过去与未来》,东京:国际问题研究所 2008 年版。

区的关注。^①

由于上述内外原因,日本为促进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提出了“福田主义”。“福田主义”的三项原则为:不当军事大国;成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桥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②此外,日本政府将本国的外交定位为“大国外交”。可以说,“福田主义”是日本对东南亚外交主张的起点。同时,日本外务省在《外交白皮书》中特别设置了东盟章节,详细分析东盟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动向,强调日本的积极干预。

“福田主义”出台后,日本外交做了以下的尝试:第一,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机制化。1977年3月,建立“日本-东盟论坛”。从提出“福田主义”开始,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迅猛。譬如,在第二次日本-东盟论坛上,日本给予东盟工业项目10亿日元贷款,并创立了文化基金,讨论“稳定出口贸易所得制度”等。双方的共同协议,除“稳定出口贸易所得制度”以外全部得到落实。1978年6月,由当时日本园田外相提倡的日本-东盟外长会议召开。^③除了密切的政治对话外,双方的对话形式还扩展为外长级扩大会议。1979年2月,日本同东盟召开了经济部长级会议,并将这个经济论坛机制化。

第二,推动越南融入东盟。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来改善双方的关系。譬如,日本外务省向东盟各国购买商品援助越南,并通过商品援助关系,建立东南亚国家之间特别是越南和东盟之间的友好关系。至此,日本外交开始转变为重视亚洲的“桥梁外交”。上述外交政策的调整,始于1978年的日本-东盟外长会议。同年7月,越南参加了“经济互相援助会议”(COMECON),对中苏对立问题表示了担忧。日本遂邀请了越南副外长访问日本,两国直接进行协商。日本园田外相还表示,坚持以经济援助为前提的自主独立外交路线。

第三,提高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社会中,日本外交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东南亚国家。日本在国际社会就东南亚问题发声,确实有助于提高东南亚的知名度。譬如,在1978年7月召开的波恩首脑会议上,日本积极发言,转达了东南亚国家的意愿,提出了抑制发达国家保护主义、讨论共同基金、援助倍增等议题。此外,日本还派

① 日本外务省编:《外务省百年》(第2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版,第239页。

② “东南亚之旅令人注目 小泉翻新‘福田主义’”,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1/15/content_238766.htm, 2014年6月27日访问。

③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青書——わが外交の近況》,1979年。

出对外经济担当大臣赴东南亚国家对首脑会议的成果进行说明。但是,1979年,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日本停止援助越南,导致“桥梁外交”的中断。“福田主义”和“桥梁外交”的出台显示出日本外交政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日本通产省和日本财界对此也表示欢迎,甚至一部分财界人士把东南亚称为“日本后院”。但是,在现实中,日本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而日本经济外交手段单一,主要是依靠官方援助,这是其重要缺陷。虽然“桥梁外交”最后遭遇失败,但在“福田主义”的外交理念的影响下,日本开始直接干预东南亚地区的纠纷。

国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政策,有以下三点评价:第一,日本在二战后推进的经济外交过程中,为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利用了东南亚国家。“福田主义”的出台意味着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二,从“福田主义”至今仍然发挥影响的现实来看,日本外交依然是“被动型”或“反应型”的外交;第三,这一时期,日本的东南亚外交进入了新的阶段,体现了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①

(三)“积极自主外交”阶段(20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经济大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助长了日本在政治上的野心,也必然导致其在外交政策上作出调整。

20世纪80年代,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军事上开始后退,并要求日本填补美国撤退后的空白。这一时期,日本为了解决地区纠纷,开始重视地区组织——东盟,并希望与地区组织一起在东南亚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也正是从此时起,东盟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1978年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事件的发生,为日本外交发挥政治作用、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首先,在1980年8月的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上,日本伊藤外长表明了停止援助越南的立场,表示在有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上,日本和东盟步调完全一致。1981年1月,铃木首相打破惯例,在访问美国之前,先访问了东南亚各国,强调与东盟各国“一同思考、一同努力”。同年7月,日本在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接纳联合国维和部队、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退、实行自由选举和国际保障制度以及政治解决冲突问题的宣言。1981年在日本-东盟外长会议上,日本又掌握了会议主导权。1982年6月在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上,日本声明支持东盟的立场和政策,还提议设立“自主返回难民接纳中心”,以减轻东盟的负

^①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青書——わが外交の近況》(33号),1989年,第308-317页。

担。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尤其在参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在与美国协调的基础上,明确了对东盟的态度,提高了外交的自主性,这体现了日本对政治大国身份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各国在这一时期开始积极评价日本的作用。其中,新加坡的“向日本学习”和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种政策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1981年就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积极推进“向东看政策”,期望通过模仿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实现马来西亚的现代化。他不仅鼓励和奖励日本企业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和企业合资,还通过向日本学习先进经验改革劳动和教育政策。上述变化给日本-东盟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东盟发展为“互补型”关系,这也是双方认知变化的结果。以上可见,80年代日本的“积极外交”带来了积极的成果。1985年之后,日本对东南亚投资进入高峰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南亚确立了霸权。但笔者认为,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对东盟各国的经济援助,只是使日本对东盟的政治领导成为可能,并没有实际转化为日本对东盟的领导。

(四)“重视东南亚外交”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

1989年冷战结束后,亚洲的国际关系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各国开始增强地区意识,这使国际关系出现地区化现象。受欧洲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启发,在亚洲也出现了把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中心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合作”设想,但遭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反对。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日本经济外交进入“重视东南亚外交”的阶段。在亚洲,日本的外交能力达到了在美国相对衰退时独立发挥政治经济领导力的水平。与此同时,东盟的外交能力也大幅提高。

第一,“重视东南亚外交”起始于1993年1月发表的“宫泽主义”。“宫泽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1)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促进和强化地区内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对话,日本将积极参加未来保障安全的新秩序的建设进程;(2)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开放性与发展;(3)促进民主化,致力于人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4)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携手构筑东南亚国家的繁荣与和平。^① 这四项特征表明日本的经济外交依然重视日本的政治和安全保障作用,同时也显示了与以往的东南亚政策的区别。

第二,1980年初到1990年初,日本开始重视东南亚外交与日本的全球主义之间的矛盾。举例来说,1990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

^①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第1卷),1993年,第168-173页。

体”(EAEC),并希望日本发挥“龙头”作用。这个设想不仅将美国排除在外,更以对抗欧洲和美国主导的地区化为目的。这使日本陷入了“重视亚洲”还是“对美妥协”二者选一的局面。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攻势,连美国也感到忧虑,担心在东亚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美国要求日本承诺不参加“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使日本政府处于重视美国和重视东盟的夹缝中,经常作出违心的决定。日本外交自主性的缺乏也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

在亚太时代来临之际,日本“重视东南亚”的外交政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日本外交政策不进行根本性改革,亚洲时代的日本很可能被孤立起来。但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不可能真正地实行“重视东南亚”的政策。

三 21 世纪日本的东南亚经济外交政策

要了解当下的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绕不开前文所述的“福田主义”,它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如今的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存在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小泉福田主义”;另一种是福田康夫执政时提出的“新福田主义”。

小泉政权对“福田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2002年1月,小泉首相在新加坡的政策演说中提出了“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构想”。这个构想主要体现在日本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协定中,该协定也是日本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提案。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在这次演说中声称:“我们携手构筑共同进步的共同体”,强调要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①

小泉的设想是以日本与东南亚合作为基础,与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一起组建共同体,而日本和东盟是这个共同体的中心成员。随后,日本外务省又加上了印度,将上述共同体发展为“东盟+6”,即“10+6”。这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有了新的方向。

近30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小泉在新加坡的演说中指出:“在东亚、东南亚,各国存在的纠纷已经解决,和平发展已经实现。东盟的成员已经增加到10个国家,并且亚洲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有了显著进展,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先后加入了WTO。美国多次发生了恐怖主义活动,人们对安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东亚的和平与安定,需要我们一起来维护。”小泉声称,日本与东盟是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所以

^① “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日本外务省网站,2003年12月,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koiasean-03/index.html>, 2014年6月27日访问。

他强调在解决恐怖主义、海盗、能源保障、传染病、环境、毒品与劳动力输出问题的同时,认为“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可以扩大到世界范围”。^①可以看出,小泉政权在东盟外交上野心勃勃。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仅局限于经济外交,而是表现出对东亚政治及其他领域进行干预的意向。这也预示着当今日本在东南亚的外交正在向价值观外交发展。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警惕。

另一个趋势是“新福田主义”,即福田赳夫之子福田康夫在2007年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对东南亚的政策方针。其主要观点是:(1)坚决支持东盟已经开始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进程;(2)日本将把同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公共财产加以强化;(3)日本将以“和平合作国家”标准要求自己,致力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4)加强青少年交流;(5)应对气候变化,尽早达成《后京都议定书》框架协议,努力实现低碳社会。总的看来,福田康夫政权继承了其父的政治遗产,对亚洲外交非常重视,并声称要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②但是,一年后,由于支持率低迷,福田首相下台。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南亚外交,不管是有价值观外交倾向的“小泉福田主义”,还是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都是在“福田主义”基础之上的更新与发展。

展望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日本构筑与东盟的长期紧密的关系。东盟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也以经济为中心发展了彼此的关系。为了保持东盟地区的和平与安定,日本必须努力与周边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框架稳固中国、日本和东盟的外交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对东盟仅发展了经济外交,不足于长期维持与东盟的良好关系;第二,日本和东盟进一步合作的领域。由于美国重返亚洲,要求日本对东南亚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日本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只能在禽流感、恐怖主义、毒品与海盗等所谓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东盟积极合作;第三,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东亚共同体,以何种形式建立、有哪些国家参加、共同体的职能等问题目前还不明确。但是,东盟的目标是在2015年建立经济共同体,如果把东盟经济共同体看成东亚共同体的母体,那么日本应该会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构建,这将是近期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外交方面的一个重要指向。

① 日本外务省网站, <http://www.mofa.go.jp/mofaj/>, 2014年6月27日访问。

② 孙承:“日本外交的‘新思维’”,《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

四 余论

21 世纪初,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外交政策,这使日本在东南亚的外交力量相对以前有所下降。日本把外交的重点转移为从属于美国的对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外交。总体而言,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水平存在差距;二是地区经济结构存在等级关系,即日本提出的“雁形理论”,在地区经济结构中,日本处于“领头雁”地位;三是通过加强经济外交,稳步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但这三个前提在新的形势下不再有效。首先,因为亚洲各国与日本的经济水平差距迅速缩小;其次,中国和韩国经济快速增长,而日本由于经济泡沫的破裂,经济长期不景气,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白热化;再次,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逐渐紧张,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虽然东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的亚洲经济外交时代已经终结,但是“福田主义”对日本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注重交流与对等合作的“福田主义”,主张非军国主义的日本与东亚国家发展良好的关系,进而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基础。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上台后,放弃拥护文化、政治、传统的多样性的“福田主义”,对亚洲各国进行价值观外交。日本今后是强调价值观外交,还是继续经营与亚洲各国的关系,还有选择的余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日本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致力于构筑与东南亚友好信赖关系的日本经济外交时代已经结束。

(作者简介:葛建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系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